



一代報人—程滄波其人其文

「讀人閱史」之八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程滄波（1903-1990），原名曉湘，又名中行，字滄波。江蘇武進人。1903年出生於武進城裡花椒園，武進昔為常州，為江南富庶之地，魚米之鄉，人文薈萃，讀書風氣甚盛。程滄波的父親程景祥，字葆真，舉人出身，但仕途不順於是改走幕途。程滄波說：「在前清，幕府中的人才輩出，無論是屬於上述哪一類，不知薈萃了多少聰明才智、博古通今的人。父親是經過七年『學幕』訓練出來的，他在前半生，是辦理實務的幕職，而在後半生，是兼辦政務與實務的幕客，他在山西、河南等省，常常兼著巡撫及藩司兩個衙門的總文案，常常三四年沒有回家一次，公務之忙碌可想而知。」程滄波四、五歲時，隨父母一家四口到杭州，當時父親在浙江藩臺衙門做幕客。三年後，父親隨浙江藩臺調升到山西去，他們全家仍回常州。回常州的第二年，家裡請了塾師馮蘊明，開蒙入學。民國成立，程家的家塾也解散了，程滄波考入當時的冠英小學高等一年級。在入小學前，在家塾讀了五年。

1915年夏，程滄波小學畢業，考取了常州中學。而就在開學前十天，父親忽然讓他拜錢名山（1875-1944）為師，因此他並沒進常州中學。錢名山一生與詩書為伴，文章道德，深孚眾望，被譽為「江南名儒」。程滄波在此讀經、習文、學詩，孜孜不倦，加之聰慧敏聞，好學強記，奠下優異的國學基礎。也因此深得錢名山之期許，錢名山有兩位女兒素蕓、雲蕓，都能詩為文，於是分別許配給弟子中之佼佼者謝玉岑與程滄波。

跟著錢名山，又讀四年私塾。1918年，程滄波進入上海南洋中學，畢業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，讀了三年文科，於1924年轉學入復旦大學政治系。程滄波說：「民國13年前，在上海認真讀文科的學生，其選擇只有聖約翰或復旦。這兩個學校平時互相轉學的學生尤多，本人也是從聖約翰轉到復旦的一個。從自身的親歷，覺得聖約翰讀書實在認真，圖書儀器實在完備。而復旦學生的活動精神與能力，確是驚人。復旦師生間的政治意識，開朗而發達。當時頗有識力過人的家長，曾經說過：最好送子弟先在聖約翰讀兩年或三年，再到復旦讀一年或兩年，然後到外國去留學。」

程滄波在學期間即從事政論著述及編譯，介紹近代思潮，文章常刊於上海各報刊，但他走上報壇是和陳布雷分不開的。1923年他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，與同學陳訓恕拜訪其兄長，時任《上海商報》主筆的陳布雷，在這之前程滄波有兩篇文章投給《商報》，似是論太平洋會議

的。見面之後，陳布雷盛稱他的文章，給他極大的鼓勵。之後，他經常替《商報》寫文章。程滄波回憶說：「民國13年冬天，齊盧戰爭未終，京滬路中斷，寒假中我留在上海，當時上海報界陰曆過年停版七天。有人借《商報》出年報。我天天晚上去《商報》寫雜評。《商報》當時經濟奇窘。兩大間編輯室，勉強生了一個火爐。但是我們在其中，幾包花生米，其樂無窮。有時布雷先生夜深偶然到了。我們更覺得一室生春。公展先生是要聞主編。他的工作緊張，很少時間可以隨便談天。我與《商報》館，有三四年的歷史關係，各種文章寫過篇數不少，從來沒有支過一文稿費。但當時我從梵王渡到租界，幾視望平街和我的老家一樣。可以想見布雷先生當時對青年們吸引力之大。」

在復旦大學時，程滄波結識了來自江蘇吳江縣（蘇州）的費鞏。費鞏（1905-1945），原名費福熊，字祥仲。費鞏的父親費樹蔚字仲深，19歲中秀才。吳大徵奇其才，將女兒吳本靜嫁給他。費鞏因早與袁克定之長女袁慧泉（又名袁家第）有婚約，所以在學校時的別號為「駙馬爺」。程滄波說：「可是他在學校及後來進入社會，絕少發現他有絲毫的『少爺』氣息，他很質樸，也很沈默。後來進入社會，態度尤為莊重而嚴肅。……我和他在復旦大學相處只一年有半。……在復旦我比他高一班，比他先一年畢業，可是他比我先到英國，我到英國去讀書完全由他事前替我籌備一切。」

1925年，程滄波畢業於復旦大學。畢業後由陳布雷推薦在上海《時事新報》擔任主筆。1927年4月，陳布雷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，5月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。程滄波說：「當時我在宣傳部服務。中央黨部由鐵湯池遷到成賢街。我們的辦公室，只隔一個天井。」

1930年，程滄波去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進修，當然這是費鞏幫他安排的，費鞏在1927年到該院留學，1931年才轉英國牛津大學。程滄波回憶說：「距今三十二年前的10月初，我從巴黎到倫敦，到維多利亞車站，費先生已在月台上接我。……費先生預先替我租了一間房間在倫敦郊外叫Herne Hill地區。該處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要乘公共汽車半小時方可到達。……晚上我們討論到大學去註冊入學，……他問我的志趣，我說我還是從Prof. Laski罷。他說那不嫌太空疏麼？我說我早就走入『空門』了，現在還是一空到底。所以我以後在倫敦政經學院把拉斯基教授的功課大半選讀了。除了英國憲法外其餘都是政治理論，真是『一空到底』。」程滄波在國內讀大學時就讀拉斯基關於主權論的著作，在倫敦政經學院又親炙其議論，他說：「他教書技術的驚人地方，在他演講或教書的時候，不用課本，不用札記，沒有一刻停留，口如懸河，在一小時上課時間，他的演講整整六十分鐘，不少一分不多一分。在講桌上，他瘦短的身材，黃黯的面色，蓄著小鬍鬚，戴上大眼鏡，用他孟徹斯特、牛津及美國混合的口音，懸懸滾滾，使聽者張口迷惘，翕然奉為大師。」儘管他對拉斯基有讚美，但也有批評，他以蘇東坡批評荀子的話，認為拉斯基「喜為異說而不讓，敢為高論而不顧。其言，愚人之所驚，小人之所喜。」又說，拉斯基少年成名，抱著縱橫之志。他的自誇狂，與其說他「自許太過」，毋寧說他「自視過卑」。



1931年春，程滄波學成回國，任國民會議秘書。1932年5月被任命為改組後的國民黨黨報《中央日報》的首任社長，29歲的他，在新聞界嶄露頭角，更領一方重鎮，自是責任重大，於是他對報紙進行整頓，他後來在〈四十年前的回顧〉文中說：「我進《中央日報》的政策，第一要把報辦好，在新聞報導上，在言論上，乃至廣告發行上，先把這份報紙站在國內新聞界可以不愧為一個領導的報紙。我當時深切認定要造成報紙的領導地位，不能依賴政治力量，而要靠報紙本身站得住站得出。我針對一個官報的弊病，確立辦報要多登新聞的政策。《中央日報》編經兩部的職員，要使他們都負有採訪新聞的責任，然後由量的增加而去淘鍊質的精選。務使《中央日報》的讀者，披閱報紙沒有官報的印象，而當天的新聞不但不能較其他各報落後，且要超出。」。

1933年4月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被捕受審，陳獨秀及其律師章士釗在法庭上的辯論，十分犀利，國內南北方的輿論受其影響，聲援陳獨秀，程滄波見狀，親自執筆，以〈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——答陳獨秀及章士釗〉為題，撰文刊於4月26日的《中央日報》，嚴加駁斥，其結論曰：「陳君獨秀在法庭抗辯，謂法庭對人民之政治思想加以判斷，即非人民之法庭。夫陳君自視於一切法律無所容心，本無庸為之多辯。然據檢察官之論告，則陳君之所犯，或決不止於思想，而在其組織團體之行為。陳君所言，自有其立場！吾人雅不願為之窮究，惟章君行嚴則以學律之人，而辯詞全文中，乃不知現行法律。且於現行之根本法亦忘之。文采智辯，毋乃用非其地。萬言辯詞，在法律上之價值，遂無足觀。章士釗之名氏，將永不能與法家或名律師相連綴。而終無改其縱橫談士之面目也乎！」。該文引起章士釗於5月4日在上海《申報》發表〈國民黨與國家〉一文反駁；而5月7日，程滄波又發表〈再論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——答章士釗〉於《中央日報》。程文行文流暢，說理清晰，辯駁鏗鏘有力，博得輿論極大的同情與支持，卒使陳獨秀屈服於法律。陳布雷因此而由杭州致函給程滄波說「為之喜而不寐」，而時任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的楊永泰也由南昌致電申賀。

1936年12月12日下午，西安事變消息傳到南京，下午五時後，京中黨政軍高層人員，齊集闕離閣何應欽部長公館。根據程滄波的記載，中央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，於晚間九時開始。當時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於晚間十二時由上海乘飛機到京出席會議。會議舉行到翌晨五時三刻方散，程滄波馬上到《中央日報》寫〈昨日西安之叛變〉社評，發表於當天之報紙云：「昨日西安之叛變，截至今晨五時，京中所得消息，為張學良率部劫持蔣委員長，發表通電，主張推翻政府。西安自昨晨起，電報中斷。叛變經過詳情，各方所得報告不多。然張學良率部叛變，已為確定之事實。」緊接著嚴厲聲討張學良，文中說：「張學良之過去，今不必談。張學良之今日，身膺軍寄，受命負剿匪之重任。當國家憂危之日，坐糜餉糈，對國家無尺寸之功。乃復假借名號，犯上作亂。此其罪大惡極，不容於誅戮。張學良昨日之行為，不但對長官為叛逆，實與全國國民為敵，與整個民族為敵。西安雖被叛兵盤踞。在中央之立場，若不嚴伸國法，立予聲討，將無以對人民付託之重。全國將士，於此犯上叛國之逆賊，若不急起剿除，

又何以對國家倚畀之殷。昨夜中央聯席會議之決議及國府明令，此種態度已極顯明。張學良叛變之剿滅，必然是短時期內之事，張學良之剿滅，不必需要大量之軍力。全國民意之力量，全國人民之良知發揮，足以奪其魂魄，足以使其望風奔潰。」

由於程滄波能文，蔣介石經常召見嘉勉，我們知道蔣介石的許多重要文告，多出自於陳布雷的手筆，但有兩篇最重要的文告，卻都由程滄波執筆。一是1937年7月17日的〈對蘆溝橋事件的嚴正聲明〉，一是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之引退文告。前者是因為陳布雷在病中；而後者因陳布雷已自殉之後。關於前者在《滄波文存》中有詳細記載撰文的經過，在此不再贅述。程滄波從奉命撰稿到完成這篇攸關中國生死存亡的文告，僅花兩個半小時，下筆極快而結構井然，足見其才情煥發，倚馬可待。其中有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及「戰端一開，地無分南北，年無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，皆應抱犧牲一切之決心。」、「此事發展結果，不僅是中國存亡問題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。」、「『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』，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爲人世悲慘之境地。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，都無法忍受的。」、「我們希望和平，而不求苟安；準備應戰，而決不求戰」之警句，正氣凜然。而蔣介石引退文告有「假令共黨自此覺悟，罷戰言和，拯救人民於水火，保持國家之元氣，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，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，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，在此原則下，致和平之功，此固中正馨香祝禱以求者也。」兩篇文告字字鏗鏘，發人深省，允爲歷史不朽之作。

1937年10月底，程滄波奉派去歐洲，當時預定的行程，是先到義大利，經巴黎到北京布魯塞爾，再轉倫敦。程滄波說他到倫敦時，「聞首都淪陷而家屬消息不明者數月，疾苦慘痛，乃爲有生以來所未有」。次年2月底，程滄波接到陳布雷從漢口寄到倫敦的信，信中有「江南千里，公私塗炭」之語，後來陳布雷要他留在歐洲等冬天再回國。但程滄波因公私迫促，在1938年4月間就離英返國。5月13日由香港飛漢口，晚間陳布雷特由武昌渡江來看他，兩人相見唏噓，幾如隔世。當時《中央日報》已遷往長沙出版了，因此程滄波在漢口稍留，即乘輪到長沙。《中央日報》暫借長郡中學辦事。全體員工，亂後重逢，悲喜交集。在長沙不到一年，抗戰轉入艱苦階段，《中央日報》奉令在重慶復刊。以社址難求，編輯部在會仙橋，經理部在新街口兩處辦公。程滄波回憶抗戰期間重慶艱辛的歲月說：「民國28年『五三』、『五四』大轟炸，重慶報紙被炸毀的不止一家，《大公報》、《新民報》、《新蜀報》以及《時事新報》，與《中央日報》均有毀傷。5月4日的下午，天氣晦冥，警報不停，中宣部奉委員長諭召集各報負責人商討善後，決定戰時首都日報不能一日停刊。當場在我的寓所——領事巷康宅，決定組織重慶各報聯合版，公推我爲主任委員，開始在《時事新報》辦公；後《時事新報》再被炸傷，改在《國民公報》辦公。我每晚在辦公，編輯部及經理部均由各報分別派人組成，這一個聯合版，前後維持一百天。在一百天後各報方分別出版；所以到抗戰勝利，戰時首都，日報沒有停刊一天。抗戰勝利後，我會見許多戰前日本的新聞界舊友，每以此自負。」



1940年秋，程滄波被免去《中央日報》社長之職，而調到監察院去任秘書長的閒職。對此香港名報人陸鏗在《陸鏗回憶與懺悔錄》中說：「程主《中央日報》八年半，直至1940年秋因桃色事件下臺。自古才子愛佳人，原來，儲安平在程領導下任《中央日報》編輯部主任，其妻女作家端木露西，不僅人長得漂亮，文章也寫得好，程爲之動心，乃趁儲安平赴英學習機會，窮追而得手。儲得知此事，在其鄉前輩吳敬恆（稚暉）先生面前告了程滄波一狀。吳言於蔣介石，蔣把程喊去罵了一通。《中央日報》社長勢難繼續當下去，乃呈請辭職。于右任先生愛才，且認爲『風流無罪』，隨把程滄波叫到監察院任秘書長。端木露西女士也爲這一段感情糾葛，寫了一篇相當轟動的文章：〈蔚藍中的一點黯淡〉刊於重慶《大公報》，風傳一時。」對於此事，當時也在《中央日報》主持編務，後來成爲陶希聖的親家的劉光炎，在《梅隱雜文》一書中說：「《中央日報》的副刊，也花樣百出，最鬧猛的是女記者端木露西鬧桃色新聞，把報館幾乎搞垮了。這位女記者非常風騷，她其實很喜歡我，曾百端挑逗，喊我是：『可憐的孩子！』我因心有專屬，絕不動心，她終於把我沒有辦法，搖搖頭去了。她的丈夫後來恍如大夢初醒，知道自己只是『賠了夫人又折兵』，一無是處，一怒離開報館，從此到上海辦了一個《觀察》雜誌，專門拆國民政府的臺。他就是早期被共黨利用，終於在『大鳴大放』中栽了跟頭的儲安平！」。

在重慶期間，程滄波還兼任重慶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，主講《新聞評論與新聞採訪》。他指定選修「社論研究」的學生，必須熟讀：《東萊博議》、《陸宣公奏議》、《古文辭類纂》、《唐宋八家文》、《唐詩別裁》。此外必須參閱：《資治通鑑》、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義》。菲孝（H.A.L.Fisher）《歐洲史》（*A History of Europe*）、白芝浩（Walter Bagehot）《英憲論》（*The English Constitution*）、阿克敦（Lord Acton）《自由史》（*History of Freedom*）及蒲徠士（James Bryce）《歷史與法理的研究》（*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*）。程滄波認爲這是養成新聞記者的課程，也是評論記者培植的條件。

1941年，程滄波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往香港，任《星島日報》總主筆，進行大規模的人事重整工作。不到半年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他又回到重慶。曾與成舍我等人合作組織「中國新聞公司」，投資經營重慶版《世界日報》，主持該報的社評委員會，任總主筆。「中國新聞公司」以「提倡民主建設，獨立經營新聞事業」登報招股舊法幣1000萬元（第一期股額），按照成舍我和程滄波的想法，是計劃先在重慶辦起一家《世界日報》，待到抗戰勝利結束，還要以首都南京爲中心，在全國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大地區主要城市，分期陸續辦起十家大報，都使用《世界日報》命名。這一方展現他們雄偉辦報的氣魄，另方面也可省去分開申請立案的煩難手續。抗戰勝利後，國民黨政府委任他爲江蘇監察使重返江南。1947年辭去監察使職，擔任《新聞報》社長。《新聞報》爲上海大報，人才鼎盛，程滄波領導員工倡導民主自由。論述憲政規模，成爲正統輿論重鎮。1948年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，程滄波爲中國首席代表，率團與會，會中對採訪及言論自由，提出新穎的意見，受到各國代表的重視。1949年

5月，程滄波去香港任《星島日報》總主筆。1950年冬，在香港與王雲五、卜少夫、陳訓畚、陶百川、左舜生、阮毅成、徐復觀、劉百閔、雷嘯岑、許孝炎等籌辦《自由人》三日刊，成舍我任社長兼編總輯，董事長為左舜生，總經理卜少夫。1951年3月7日《自由人》創刊，程滄波寫發刊詞，題為〈我們要做自由人〉。同年到臺灣。

程滄波畢生為新聞人，但黨政經歷豐富。1931年當選立法委員，嗣後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，抗戰時期擔任監察院秘書長、中央宣傳部次長，勝利後奉派為江蘇監察使，負責江蘇及京滬二市的監察任務。1948年再度當選行憲立法委員。1951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，嗣膺聘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。六十年代初期，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成立，程滄波以立法委員身分與會，自第六屆起連任五屆中華民國代表，折衝國際議壇，多所建樹。

1971年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議成立，程滄波被推舉為主任委員，任內擬訂各種道德規範，作為評議依據。他呼籲同業自律，諒解新聞評議會所扮諍友的角色，共促新聞事業臻於至善至美之境。程滄波擔任此職長達十八年，國民黨以其推展新聞自律有功，於1988年他退休時頒贈實踐一等獎章。在臺期間程滄波還擔任中央政治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。

程滄波詩文兼擅，他自弱冠操觚，下筆千言，然散佚之文字，十有五六。他說：「曾輯民國12年起至18年冬全部論文散見於當時報章雜誌者共二百篇，交上海華通書局出版。不意時間兩年，書店倒閉。不惟殺青無期，併所交存稿，亦全部遺失。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之前，余在香港主持《星島日報》筆政，全部論文百篇，已謄錄付梓。卒因香港淪陷，稿版俱毀。民國34年，重慶《世界日報》成立。自春徂秋，前後所著論文，亦幾百篇。因勝利復員，因循未及輯錄。至今同付劫灰。」他對於撰寫這些時論，感慨良多，他說：「竊以為時事論文，雖與經世鉅著或學術專集，未可並論。然時論作者，當其籌思振筆，發為文章。每於午夜漏盡，燈昏目眩。時或酷暑流金，几案炙手；或厲寒砭骨，筆硯成冰。而時間及環境之束縛顧忌，理想與現實之調和斟酌，蓋非親歷其境者，不能道其甘苦於萬一。」因此他將民國23年前後在《中央日報》所撰的時論42篇，及抗戰勝利到行憲在上海《新聞報》所撰的103篇，分別以《時論集第一編》及《時論集第二編》於民國43年8月及10月在臺北出版。另又刊行有《歷史文化與人物》一書。1983年，復從上列三書中，選其得意之作69篇編印成《滄波文存》出版。《滄波文存》於英國兩黨政治研究，有透徹之分析。書中臧否人物公正不阿。書末輯詩鈔與聯作，凡百數十首，雖屬小道而文采燦然。讀此書者，莫不以「擲地有聲」稱譽之。

1990年春末，程滄波因罹患心臟病，併發肺炎，乃入臺北市忠孝醫院診治，未見起色，竟於是年7月21日溘然長逝，享年八十有八。

延伸閱讀

程滄波（1983）。滄波文存。臺北市：傳記文學雜誌社。